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明〕徐有貞
徐有貞集
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徐有貞集

〔明〕徐有貞 撰

孫寶點校

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徐有貞集 / (明) 徐有貞撰 ; 孫寶點校.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5.8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ISBN 978-7-5340-4453-3

I. ①徐… II. ①徐… ②孫… III. ①徐有貞 (1407~1472) —文集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174643號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徐有貞集(全二冊)

〔明〕徐有貞 撰

孫寶 點校

責任編輯 雍 琦

裝幀設計 江健文

責任印製 陳柏榮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網 址 <http://mss.zjcb.com>

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製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28.5

字 數 38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5340-4453-3

定 價 180.00圓 (全二冊)

ISBN 978-7-5340-4453-3



9 787534 044533 >

如發現印刷裝訂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前言

一

徐有貞（一四〇七—一四七二），原名瑄，字元玉，吳縣（今蘇州）長洲鳳凰鄉吉祥里人。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土木堡之變爆發，徐有貞倡議都城遷南京而遭致朝野非議，隨之在正統、景泰年間仕途蹭蹬，在大學士陳循授意下改「瑄」作「有貞」。據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十「徐有貞」條載：「（景泰）二年，（徐）瑄因屢薦不允，一日爲陳循推命，侑以玉帶曰：『推先生命，玉帶至矣，故敢以獻。』循受之，乃教瑄曰：『汝當更名，毋使內家習知也。』即更名。」可知，徐有貞更名當在景泰二年（一四五二）。

由吳寬《耕隱翁墓表》與《天全先生徐公行狀》知，徐有貞曾祖徐文貞、祖徐子復、父徐孟聲均不顯仕宦，其有兄弟三人，排行第二。長兄爲松庵府君，名字不詳；三弟徐有賢，字元僅，因父母早喪，放棄科試，專力于農商，苦心經營而家業豐贍。

徐有貞自幼便秀異穎脫，十二三歲入小學，熟諳古文辭，秀出班行。轉從名儒吳訥問學，後經由吳訥推薦，從國子祭酒胡儼受舉子業。吳訥精通小學、文史、刑法之學，胡儼擅長天文、地理、律历、医卜之學，這對徐有貞立足儒業、涉獵博通的治學特點具有直接影響。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徐有貞中順天府鄉試。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九「宣德癸丑科」錄「徐有貞武功集八卷」，注：「榜名理，字元玉，宛平籍，吳縣人。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封武功伯。」可知，徐有貞當爲占籍宛平而中式。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徐有貞進士及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因對策卓異而授史館編修。

正統初，徐有貞與修《宣宗實錄》、《玉牒》，遷爲經筵侍講。正統十四年，瓦剌首

領也先率部反叛，英宗輕率親征，同年八月被俘於土木堡。于謙主持軍政，派遣文臣以監察御使身份分守各地，并組織當地軍民勤王。徐有貞被委派至河南，先綏撫治所彰德的山中流民數萬人，對其加以軍事訓練，以作勤王之用；又於湯陰祭祀岳飛墓，爲之建立祠堂，撰制《精忠廟碑》，以激發當地軍民勤王的士氣。也先敗退後，由於郕王朱祁鈺已在英宗被俘期間登基，是爲景帝，英宗遂遜位，爲太上皇。隨之，徐有貞召還，治績爲分遣各地文臣之首。

景泰二年（一四五二），徐有貞升爲春坊諭德。當時黃河至山東沙灣段決堤，漕運不通，爲患多年。景泰四年（一四五三）十月十一日，商輅以徐有貞熟知水利，薦舉其爲都察院右僉事都御史，使赴山東治理水患。到達張秋後，徐有貞廣泛巡訪民情，親自勘察水患區的徑流分佈及其源流走向，制定了詳密的治水方案。鑒於此前多年治水兵民已疲敝不堪，他分批漸次遣返勞工回家，與之約定來年開工日期，以使之得到充分休整。經過近两年的治理，徐有貞除修築堤壩抗洪防災外，主要疏浚由張秋金隄至濮陽泊、博陵陂、沙河、東西影塘、白嶺灣、竹口蓮花池、大瀦潭等水道，以

聯通黃河自范濩、澶淵、河沁而來的水路，其將所筑之渠命名爲「通濟渠」，并建立「通源閘」八道，以調節水勢。經其疏導，黃河之水由沙灣改行距其十二里的張秋，自此與臨清、濟寧的水路貫通，漕運也得以恢復，并惠及兩岸農田灌溉。治水期間，徐有貞還拜祭曲阜、鄒嶧的孔孟祠堂，治水功成，徐有貞返朝，上書恢復并擴大孔孟祠堂多被侵佔的祭田，并分配佃戶耕種，以供日常祭祀之需。徐有貞後於景泰六年（一四五五）撰制《大明賜復顏孟廟田之碑》，以旌揚孔教。

景泰八年（一四五七）正月，景帝染病，罷朝數日。正月十一日，已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徐有貞與左都御史蕭維禎開始謀劃冊立皇儲之事，召集石亨、張輓、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以及文武群僚等於左掖門商議封事起草事宜。十三日，景帝傳旨禁止討論立儲，聲稱十七日將早朝。同日，群臣聯名請求立儲。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石亨等人則意圖輔助英宗復辟，經過多日密謀，十七日，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石亨等人借口邊事緊急，徵調城外軍馬三千多人入宮，全城戒嚴，當夜起事。徐有貞等人擁立英宗即位，以迎立襄王朱瞻塏的罪名逮捕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俞

士悅、江淵、范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等人。英宗本欲原宥于謙，徐有貞堅稱「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終以「雖無顯跡，意有之」（清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宮復辟」）爲據，將于謙、王文等人棄市。英宗復辟後，徐有貞官拜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爵武功伯，恩祿榮顯，位極人臣。然而，其一手製造的于謙等人冤獄亦引起朝野側目，是爲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污點。

天順元年（一四五七），徐有貞執掌權柄后，多次拒絕曹吉祥、石亨等人的非分請託，支持楊瑄等十七御史對曹、石侵奪民田諸事的彈劾，最終致使其與曹、石二人的短暫結盟破裂。曹、石二人不斷進讒，製造李秉彝危語誹謗朝政案，誣陷徐有貞爲幕後主使，逮捕其家人及屬吏馬士權，并嚴加刑訊。英宗本將徐有貞貶爲廣東左參政，曹、石二人又羅織罪名，誣告徐有貞謀反，英宗遂褫奪其官爵，將其流放至雲南金齒。在金齒期間，徐有貞於「鎮南寓廬陋室中，屏絕世念，惟綜玩《易》理」（明祝允明《成化間蘇材小纂》「簪纓纂一·武功徐公」條）。四年後，英宗將其放歸吳中田里。

天順四年（一四六〇），石亨罷免，坐其侄石彪謀反被賜死；次年，曹吉祥意圖

篡廢而被誅。徐有貞歸鄉後，慶倖幾經危難而終得保全，因自號「天全翁」。徐有貞當時只有五十餘歲，「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明王世貞撰《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八十八「文部·史傳·徐有貞」條）成化元年（一四六五），憲宗朱見深僅賜其章服，朝中更無爲其推轂者。徐有貞亦自知飽受是非公義的詬病而難被敘用，於是放情山水，與祝顥、劉鈺、沈周、夏昶、杜瓊、施堯卿、陳孟賢、陳孟英、劉廣洋等致仕鄉賢組成詩社，「登臨山水爲適，不駕官船，惟服巾野服而已。所至名山盛境賦詠，竟日忘倦，或填詞曲以侑觴」。（明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下）徐有貞家境優渥，其晚年手札中就不乏「田事、租事及放米事」，（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錄》卷五「元明名人尺牘冊」）這也是其恣情遊衍的基礎。成化八年（一四七二）七月十五日，徐有貞病卒，享年六十六歲。

徐有貞一生學以致用卻頗雜陰陽方技，斥逐閹宦又黨同伐異，標榜忠義而投機傲寵，立志廊廟復寄意山林，一如王世貞所言：「辱以榮伏，毀繇名致。瑕瑜千載，矛盾一世。」（《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百四十六「文部·徐有貞像贊」）王氏

之說，洵爲的論。

一一

徐有貞政治人格思想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即爲「真儒」二字。其《文武前論》說：「予固學儒者也，懼無以自靖，且欲得吾儒者之舉，真儒也。」《文武後論》亦說：「吾之所謂儒者，蓋真儒也。腐儒非儒，又烏足道耶？故曰：欲得天下之全才，必得真儒而後可。」徐有貞的「真儒」理想具有文武合用、兼濟天下的強烈指向，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風后、力牧、皋陶、伯益、伊尹、萊朱師、尚父、周公旦、孔子、范仲淹等古今聖王賢者則是其崇奉的「真儒」楷模。他認爲經術爲儒者立身之本，研習經業則須以經濟天下、建立功業爲目標，有了功業自然就有名利，而不是相反。其《嘉定縣儒學科第題名記》說：「維夫經術，所以經濟天下之具也。士必用乎經術而後經濟乎天下，譬則梓人之必用乎規矩，而後可以經營乎宮室也。宮室完而功歸乎梓人，天下治，功歸乎士。功之所在，名之所在也。」因此，徐有貞更看重惠

及後世的不朽之名，而非榮耀當時、死後無聞的一時之名，其《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就說：「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爲名而以萬世之名爲名者，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已。」他反對將「儒」片面的理解爲尋章摘句、皓首窮經的學者，在其看來這只是「腐儒」；他也反對將文、武兩種本來在古今聖王賢者身上合二爲一的屬性剝裂開來的世俗之見，所謂「今也文不知武，武不知文。天下之人各尚其所好以自傳於二者之習，呻吟咕嗶、詡詡弄筆者，則自謂之文；跳梁搏攫、蹶蹶而馳者，則自謂之武。彼爲是者，固可笑矣。而所謂儒者，又徒矻矻自守於章句之末而不復識其所謂文、武者焉在。問之，則反以爲此非我所學」。《《文武前論》》正因如此，徐有貞在任史館編修期間，專攻天官、地理、考古、軍旅、刑獄、水利等實用之學，自稱：「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吳寬《天全先生徐公行狀》）土木堡之變發生之前，他就居安思危，預見西北邊患的嚴峻性，上奏《條議五事疏》、《戰備五事》等數千言要求加強邊防軍備，受到英宗嘉獎。「奪門之變」成功后，身兼

兵部尚書與翰林院學士的徐有貞自撰《鐵券文》說：「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才，宜典鈞樞之重任。……才堪華國，道足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明祝允明《成化間蘇材小纂》「簪纓纂一·武功徐公」）儘管上述多爲自我誇耀之辭，一定程度上也印証了他文武兼濟、名動天下的追求。

徐有貞的「真儒」思想具有「純儒」、「文儒」、「武儒」、「醫儒」、「儒吏」、「占卜之儒」、「僊儒」等外延，其顯然將「儒」視作函納眾有的極高的道德范域，且往往借助其多元化外延，闡發其對於「真儒」活潑多樣、濟世致用的理解。

徐有貞將董仲舒作爲「純儒」的典型，其《正誼齋記》說：「以仲舒自擬者，擬乎其儒之純也。儒之儒純者，學乎道，行乎誼，體乎心，用乎事。內以正己，外以正物，上以正君，下以正民。小行而小正焉，大行而大正焉。」由之可見他對漢儒表裏如一、內外兼修、正君化民的崇奉。不過，宋儒對徐有貞的影響也很大。其《濂溪遺芬圖》爲周綱文叙題《自稱》：「嗟予生晚學且迂，每懷濂洛諸先儒。雖然不獲與親炙，

平昔所事皆其書。朝來方讀《易》通罷，默坐還觀《太極圖》。……興來長誦《愛蓮說》，浩氣直與神明俱。」上述是對周敦頤的讚譽。二程、楊時也是徐有貞欽奉的儒者，其《無錫學先賢祠記》說：「夫文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初，二程之學乎周子也，宋運方盛於北，吾道亦從而北。及楊氏之學乎程子也，宋運將徂於南，吾道亦從而南。此其所關係也大矣，豈偶然哉？自龜山傳之豫章羅氏，豫章傳之延平李氏，延平傳之考亭朱子，考亭因是而集大成，則斯道之有傳於今也，實自龜山始。揆其始，雖天下之學祠焉可也，獨錫山哉？」正因受到宋代理學的影響，徐有貞強調「心法」在宗經求聖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君師論》說：「夫堯舜誠有君師之道德而能盡其任與責者也，而傳之又有心法在焉。何謂心法？《書》所謂『精一執中』是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繼而傳之。夫所以三代繼王而同一揆者，無他，以此也。故曰：得聖人之法者，則有聖人之道矣。有聖人之道者，則有聖人之德矣。有聖人之道德者，則亦有聖人之功業矣。」他甚至還用二程「心虛應物」來融通莊子「虛白」之說，其《虛白說》云：「吾以求之吾儒之說，抑猶有其至者焉。洛程氏

有云：『心兮本虛，應物無跡。』非虛白之謂乎？且其虛也，有誠以本之；其白也，有敬以主之。誠以本之，故靜亦虛也，動亦虛也；敬以主之，故靜亦白也，動亦白也。所謂誠立明通，而賢人、聖人之所以爲賢人、聖人，亦不外此。然則，其爲虛白也不亦至哉？」由上不難看出，濂溪、伊洛之學實爲徐有貞道德本體論的重要基石。

徐有貞首推的「文儒」當爲子游。其《常熟縣學興修記》說：「夫言游氏天下儒學之先哲，而常熟之鄉先生也。其于孔門以文學爲稱首，而其言學必曰道、曰本、曰禮樂之原，及其行事見于魯論、漢紀彰彰焉。然則其爲學也，豈徒文哉？蓋子游之學之道，仲尼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之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其道，雖達而在上可恥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如是，不足以言學。」可見，他并不簡單肯定子游在孔門十哲中「以文學爲稱首」的地位，而是沿用宋儒道統意識，將子游置於文、武、周、孔之道的承啟發揚的軌跡中，突出子游「文學」中對「道」、「本」、「禮樂之原」的皈依與闡發，這基本也是徐有貞評價當世「文儒」的根本標準。其《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庵吳公神道碑》

評價吳訥說：「爲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淑人心、正士習，故凡爲文章，鑿鑿焉，斷斷焉，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上述即從宗經爲文之本的角度評價吳訥。

「武儒」多爲徐有貞津津樂道。其《李光祿輓詩序》稱道李雲慶「慶平生磊落多奇，雖爲儒家子而獨喜譚武事。居常忼慨，以功名自許」的豪氣；其《孫建陽輓詩序》則認爲孫源雖爲懷遠將軍同知建陽衛事的武職，卻「爲人恂恂謹厚類儒生，動循矩度，其廉潔之操，得之天質」；其《王武德墓表》更讚許武德將軍王璟「武弁之士而躬儒紳之行」。上述亦是其《文武兼濟觀念的延伸》。

「醫儒」是徐有貞詩文中頌揚的一大主題。其《徐以純輓詩序》讚許徐以純「資淑善而好修爲，於父母隆孝敬，於昆仲篤友愛，於朋友信義交致，於鄉人賢與長者，禮之無失，又能世其家之醫學而進學乎儒」；《錢氏生幼堂記》稱道錢伯康醫術醫心：「進乎吾儒之道矣，醫云乎哉？」《盛芝岩壽詩序》稱道吳中盛氏「自其中葉以儒爲醫」的家風，尤其稱許「（盛）芝岩獨好儒術，又旁通堪輿家言，不專于爲醫」。

《陸仲文墓誌銘》贊陸尹「其行則儒，其名則醫」，稱道其「見忠義奮發者，輒躍躍歎慕，願從其游；於儉邪誤國者，則切齒怒罵，若父兄之讐，恨不手僇其人。至與人議論，動必援古折今，辯是非曲直，不苟依阿」。他還從醫理與儒理之間尋求二者的共通性，以闡發醫心、醫術的道德內涵。其《淡庵序說》說：「近世丹溪朱延修氏之爲醫也，其學上溯軒、岐，下演長沙、易水、東垣。集諸家之善而去其末，其嘗著《格致餘論》等書，獨以淡爲用藥之本，而養生、濟生。即其所言，求其所知，蓋與吾儒合也，是以吾儒與之。……擴而充之，由夫醫之道而求吾儒之道。於凡養心、養德，濟世安人，之事，皆有以得其所以然之理。」這就將醫家用藥之「淡」的醫術提升到儒者內修涵養的層次。他還關注醫術的社會政治價值。其《贈太醫院使蔣君主善序》稱道蔣主善之父「以儒醫之道事仁宗於東宮」，并強調御醫有助治化的功能說：「夫太醫之官，視百執事尤難其人。百執事之官各有司存，不能相通，故諫諍之臣常以嚴見憚而不得朝夕左右，摯御之臣常以親見狎而不能有所匡救。故既親且嚴，惟醫職爲然。蓋其出入禁近，保和聖躬，諫臣所不得至之地，而得至之摯御所不得言之事而得言

之，此其人之得失而爲損益豈小小哉？……起居服食而必謹必戒，而後政事可得而修、治功可得而成也，然則君之績豈出百執事之下耶？」可見，徐有貞并非一般的肯定醫者救死扶傷的作用，而將其提高到治國經邦的高度來看待，這與視醫卜爲賤業的世俗之見大相徑庭。

徐有貞對「儒吏」不乏讚詞。其《仰大理壽藏記》稱道仰宗泰「學明經術」，又不肯趨附閹宦說：「正統癸亥，權奸方竊政柄而弄之於內。既殺忠臣以杜天下之口，乃益爲峻法以鉗制人，毒及無辜弗恤也。時諸輔政大臣暨內外百司之長率奔走其門，雖有號君子者，亦不免屈節毀操以求容。至其小人，則遂奴事之，甚而呼之爲翁父、藉聲勢以作奸者，不可指數。其初度諸公卿皆至爲壽，而大理獨否。」上述頗有惺惺相惜之意。《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庵吳公神道碑》稱道吳訥雖以擅長醫術被舉薦，而不願「舍儒從醫」，後爲監察御史，「執法體剛而用正，侃侃之言，卓卓之行，論者謂其得大臣體」。《吳樂清墓銘》讚賞吳瓊：「在宣德、正統間，屢書民情、吏病數十事，事多施行。其言剴切而通傳于天下。國家之利病皆有所達明，非獨